

20世纪东方文学 与中国文学

Zoshiji Dongfang Wenxue
Yu Zhongguo Wenxue

孟昭毅 等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丛书

孟昭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世纪东方文学 与中国文学

20shiji Dongfang Wenxue
Yu Zhongguo Wenxue

孟昭毅 等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丛书

孟昭毅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20 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比较文学与历史文学)
ISBN 978-7-5004-9620-5

I. ①2… II. ①2… III. ①文学研究 - 东方国家 - 20 世纪
②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 - 20 世纪 IV. ①I106②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4625 号

责任编辑 王 茜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王延文

副主任：孟昭毅 杜 勇

委 员：（按姓名拼音顺序）

甘丽娟 郝 岚 吕 超 黎跃进

赵利民 曾思艺 曾艳兵

序

乐黛云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保护文化生态，发扬各民族文化特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正如著名学者恩伯特·埃柯最近在欧中高层论坛上的发言“裂缝、熔炉，一种新的游戏”中所提出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不会像在熔炉中一样，变成同一的“合金”，必须保护原有的文化生态，保持各自的文化基因，即原有的根本不同特点，形成不能复合，不相覆盖的“裂缝”，才能比较中互为“他者”，促进发展。因此，恩伯特·埃柯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应当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教育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多样性的“对视”之上，他坚持的是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在未来要承担的必不可缺的任务。

即将出版的“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在上述语境中可说是开风气之先，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丛书第一辑将出版五本，其中吕超的《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在福柯新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所谓“异托邦”大体是指在不同空间的边缘处或交叉处，会产生不同于原有空间的新的多变的不确定的空间，研究和言说这种新的空间，必须有特殊的方式方法，并将因此获得新的哲学构思和新的哲学能力。吕超以英语长篇小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同时期的不同描写所构成的张力为例，从精神气质、城市空间和城市人三个方面剖析了老上海和老北京两个异域空间的相异、交叉和重叠，很能发人深思。

孟昭毅等的《20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除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日、

韩、蒙古、朝鲜、越南等国文学进行了新的解读外，对过去接触较少的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文学都有所分析；特别是辟专章讨论了南亚和西亚、北非各国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前者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文学的关系；后者包含了埃及、波斯、土耳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学状况，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带来了过去人们较少关注，但对文化多元发展十分重要的新知识。

如果说孟昭毅等的《20 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对当前东方文学现状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了相当全面的“散点”研究，那么，黎跃进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则是将 150 年来的东方文学作为一个地区性整体，进行了纵向的区域性历史研究，特别是对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源流、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形成、启蒙思潮的影响以及当代后殖民主义的展现都作了详尽的探讨。这种“区域史”的探讨不仅是研究“已成事实”，而且是把重点放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新的空间的交叉上，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人物之间的交往和物质文化的交流等，进行动态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思考平台。

另外，曾艳兵的《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对一些重要的西方文学名著进行了新的现代诠释；曾思艺的《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对俄苏的诗歌、小说、文学翻译也有新的论述，都能收开卷有益之功，值得一读。

丛书第二辑列入出版计划的是赵利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郝岚的《世界文学与 20 世纪天津》、甘丽娟的《纪伯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黎跃进的《多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和孟昭毅的《外国戏剧经典文化阐释》。这些著作也是各位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新成果，相信这批成果对文化的多元对话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将产生促进作用，大家拭目以待吧。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11 年 3 月 16 日

前 言

“比较文学”就名称而言是舶来品，它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学术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学界勃发、成长。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学术大潮中，我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也如鱼得水般地发展起来。

最初我校中文系是在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七八级中文系学生中开设了与比较文学相关的课程。自 1982 年开始，在收集、学习和研究当时所能得到的各种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中文系开始编写《比较文学概论》讲义，并于 1983 年初完成初稿。与此同时，中文系也正式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这是针对大学四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课时为一学期。自此以后，相继开设了“比较文学概论”、“比较诗学”等比较文学课程。1983 年 6 月，我校教师与南开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从此拉开了中国比较文学腾飞的序幕。这次与会的近百余名专家学者不仅讨论了比较文学的一般原理，而且提出了“中外文学关系”、“东方比较文学”和“中国学派”等亟待深入探讨解决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学术活动，我校的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

经过中文系相关教师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心，在季羨林先生和乐黛云先生的积极支持下，我校的比较文学学科在 1993 年国务院第五批学位点申报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全国最早独立申报并获批的比较文学硕士点之一（部分院校原有外国文学硕士点，当时这两个学科尚未合并）。“九五”期间，比较文学成为学校重点学科并获得了稳定

快速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和论文,获得了不少省部级奖励和科研项目。这些比较文学的研究实绩,使学科在不事声张、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学风中茁壮成长。“十五”期间再次成为我校重点学科的比较文学,再接再厉,在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引进了赵利民、曾艳兵、曾思艺、黎跃进等中青年学者,形成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和中日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三个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在国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之在 2003 年国务院第九批学位点申报时,我校独立申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功获批。

2006 年,我校比较文学学科获批天津市重点学科,以该二级学科为基础,2009 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申请获得批准,2011 年初我校中国语言文学以及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也通过审批。“十一五”期间该学科 12 名教授中已有 6 位博士生导师,并特聘美国讲座教授一名;国家级精品课一门、天津市精品课两门,出版学术专著 30 余部、教材 20 余部,其中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4 部。现有省部级在研项目 20 余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8 项。2010 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获得天津市优秀教学团队。比较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我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又一支生力军。

该学科独力承办过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土耳其及我国台湾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国内外的学术影响。

该学科多年来培养的数百名博士生和硕士毕业生,遍布祖国各地。除天津市各地方高校外,他们有的还工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优秀毕业生分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成为教授、硕博士生导师和学术骨干。此外还培养了一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波兰、我国台湾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硕士、博士生,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为了集中展示我们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学校支持和鼓励我们编辑出版“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丛书共十本,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五本分别为孟昭毅等的《20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曾艳兵的《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曾思艺的《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黎跃进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和吕超的《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

《20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全面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文学与其他东方国家文学之间相互影响、互涵互动的关系,对于确立中国文学本位意识、构筑东方文学统一性、参与世界文学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著作既有对贯穿整个20世纪的纵向梳理,又有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整个东方范围的横向比较剖析;既有立足于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关系的宏观立论,又有针对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间相互影响的微观探析。

《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立足于中国立场和比较文学的视野,对西方文学的部分经典之作做出新的阐释。作者从变态心理分析角度阅读和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新的体验和收获;从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角度打量和思考西方传统文学经典,对古老的文学经典有新的认识和发现;对近年来似乎已经说尽,但其实不然的卡夫卡话题加以新的审视,获得谛听卡夫卡的新方式。作者的研究表明:所有的西方文学经典,之所以是“西方”经典,皆因为我们站在东方土地上言说,重评西方文学经典,既是重评“西方”,也是重评“我们”。

《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是作者多年来在俄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翻译方面科研、教学心血的结晶,其主体部分对俄国诗歌和小说进行了研究,对俄国中古著名史诗和一些重要诗人及其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肖洛霍夫等人的小说内涵和风格做出了全新的阐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俄苏文学翻译,做出全面而简要的概述,并对一些成就突出、很有特色的翻译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析,具有理论思考的独到性和资料的丰富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在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化全球扩散、东方社会做出回应的背景下,探讨150余年间在亚非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对这一文学思潮的文学渊源和纵向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

的论述,将东方启蒙文学当作民族主义文学的早期形态,以 20 世纪初期至 60 年代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为思潮发展最为成熟、典型的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至世纪末的后殖民主义文学视为思潮的延伸形态,这样把整个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视野开阔,并有理论的创新。

《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域,该书创造性应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整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城市文化、后殖民等理论,将研究对象聚焦到文学中的异域城市个案形象,重点论述城市异托邦的理论谱系、生成机制和研究范畴;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英语长篇小说)中的老北京和老上海形象作为案例剖析,重点分析它们分别体现的城市异托邦的两副典型面孔。

第二辑五本分别为赵利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郝岚的《世界文学与 20 世纪天津》、甘丽娟的《纪伯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黎跃进的《多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和孟昭毅的《外国戏剧经典文化阐释》。

《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对古代中国文学在欧洲主要国家和东方诸国的传播与影响给予比较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同时还注意文学交流中的个案研究。对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相互交融过程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及其观念做出了颇有创新性的研究,是该学术领域的一项新收获。

《世界文学与 20 世纪天津》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系统总结了 20 世纪天津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包括以近代天津文化名人、当代天津小说家与世界文学、天津翻译家与翻译活动、天津在西方戏剧进入中国进程中充当的角色等内容,将地域学术活动对世界文学的传播接受纳入研究视野加以讨论,富于创新意识。

《纪伯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全面考察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等情况,梳理纪伯伦作品中国之行的主要脉络,展示纪伯伦及其《先知》如何在中国被确立为经典的事实,进一步分析纪伯伦在中国的多重影响,对纪伯伦创作与生活的多元文化背景进行解读,为纪伯伦研究的更加深入奠定扎实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多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立足于多元对话的文化立场,对中外文学大量彼此交流互动的文学现象进行清理和研究;对中外文学史上具

有价值联系的类同现象做出平行的考察和分析；对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加以审美层面的深层思考，得出具有启发性的认识和结论。著作中对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的探讨，显示出理论前沿的色彩。

《外国戏剧经典文化阐释》对东西方主要戏剧文本进行文化和诗学两个层面的解读，得出学理上的一些规律，是作者继《东方戏剧美学》和《印象：东方戏剧叙事》之后又一部戏剧文化的力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该学科教师近年学术科研的总结，更是该学科“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的一次检阅。其中包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个省部级项目，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它虽然难免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们是每位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他们的研究特色和专长。随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我们的学术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丛书出版也还将继续。我们也愿意将它奉献给广大读者，为的是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分享学术研究带来的快乐。

回顾我校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三十年来，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脚步，涌动于人民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在天津市和学校各级领导的关怀与帮助下，在文学院全体教师的支持与鼓励下，在全院学生的理解与欢迎中，从零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筚路蓝缕，艰辛异常，走出一条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的科学发展之路。作为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了祖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而贯穿其中的正是勇气、前瞻和向历史交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方面，与兄弟院校相比，我们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相信，天津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不远的将来，和全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事业一样，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不辜负所有关心它、支持它成长的朋友们的期望。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1年3月18日

目 录

绪论 东方文学面面观	(1)
第一章 20 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	(19)
第一节 现代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交流	(19)
第二节 当代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交流	(25)
第三节 20 世纪东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34)
第四节 20 世纪东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41)
第二章 20 世纪东亚文学与中国文学	(47)
第一节 20 世纪日本文学的汉译	(47)
第二节 日本启蒙文学与中国“新小说”	(87)
第三节 20 世纪日本文学与谢冰莹	(100)
第四节 日本现代文学理论与成仿吾文艺思想	(114)
第五节 中国对村上春树的研究与吸纳	(125)
第六节 20 世纪朝鲜—韩国文学的汉译	(141)
第七节 20 世纪蒙古文学与中国文学	(149)
第三章 20 世纪东南亚文学与中国文学	(159)
第一节 20 世纪越南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	(159)
第二节 越南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165)
第三节 邓台梅与中国文学	(175)

第四节	泰国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	(182)
第五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泰国	(190)
第六节	20 世纪缅甸文学与中国文学	(197)
第七节	20 世纪新加坡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	(209)
第八节	中国现代文学在新加坡	(213)
第九节	新马华文文学“中国根”	(220)
第十节	菲华文学与中国文学	(224)
第十一节	20 世纪印度尼西亚文学与中国文学	(236)
第四章	20 世纪南亚文学与中国文学	(246)
第一节	印度现代文学的汉语翻译	(246)
第二节	泰戈尔与中国文学	(255)
第三节	普列姆昌德在中国	(262)
第四节	印度流散作家在中国的研究	(275)
第五节	巴基斯坦文学在中国	(282)
第六节	尼泊尔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	(300)
第五章	20 世纪西亚北非文学与中国文学	(312)
第一节	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汉语翻译	(312)
第二节	“旅美派”作家的作品在中国	(320)
第三节	埃及现代作家作品在中国	(329)
第四节	阿拉伯其他国家现代作家作品在中国	(340)
第五节	20 世纪阿拉伯诗人笔下的中国	(344)
第六节	20 世纪波斯文学在中国	(352)
第七节	20 世纪土耳其文学与中国	(359)
第八节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与中国	(369)
后记		(378)

绪 论

东方文学面面观

文化是文学的母胎，什么样的文化孕育什么样的文学。文学又是文化的“缩影”，素有“小文化”之称。东方文学蕴含着东方精神、东方智慧和东方情操，更是东方审美体系的符号。

一 东方·东方学·东方文学

“东方”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且有几分模糊又广泛使用的概念。它至少有下列几种含义：

第一，方位概念。讲方位就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以中国为立足点，中国的东面称为东方，中国的西面称为西方。因而长时期把印度当作西方。唐代高僧玄奘从凉州出玉门关赴天竺，称为“西天取经”，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名之《西游记》。

第二，地理学概念。按照国际的地理疆域规定，以西经 20°和东经 120°的经线圈，把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这样，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都属于东方范围。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不在东方圈内，又把欧洲的原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包括进来，大洋洲也属东方。

第三，政治学概念。20 世纪国际政治关系演变，“东方”、“西方”又具有政治的内容。二战后长时期形成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属于西方，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属东方。因而地处亚洲的日本却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成员。

第四，历史文化概念。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亚述人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亚细”（意为日出之地），古代希腊罗马人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称为“亚细亚”，还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历史文化概念的东方指除了古希腊罗马之外的几大古代文明发源地，因而包括亚洲和非洲北部地区。

我们这里讲的“东方”，是指亚洲和非洲。它综合上述的历史文化概念和地理学概念的“东方”，外延有所拓展。

“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文学、艺术、语言及其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研究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形态：传统的、现代的、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东方社会进程的规律等。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等分支学科；从区域研究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突厥学、日本学、伊朗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朝鲜学、中东学、藏学等分支学科。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萌芽于 16 世纪，确立于 19 世纪。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不乏对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的描述。13 世纪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把东方描写成仙境福地，激起西方航海家探寻东方的热情。之后随着西方向东方的扩张，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东方，他们编写了关于东方文化习俗的著作。16 世纪末的巴黎大学，17 世纪的牛津大学开设了近东语言讲座。牛津大学首任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考克（1604—1691）著《阿拉伯史纲》（1650），开创了阿拉伯研究的先河。17 世纪末，欧洲的东方学家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写的系统性著作，如戴倍罗等人编订的《东方文库》（1697）等。18 世纪东方语言研究获得发展，东方经典的准确译本出版，中国的《易经》、阿拉伯的《古兰经》、波斯的古经《阿维斯塔》、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等都陆续译出。英国学者威廉·琼斯（1746—1794）开始进行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一些西方国家还创办了专门的东方语言学校。

19 世纪东方学在众多方面获得突破和发展。首先是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解读成功。格罗特芬德破译波斯楔形文字，罗林逊对亚述巴

比伦古文字的解读,商波利翁发现埃及象形文字。多次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印度、中国的考古取得成果。其次,东方语言学发展成熟。大型东方语言工具书,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马礼逊著,1828)、《梵文字典》(7卷、波特林格等著,1863—1894)、《中俄大辞典》(帕雷底阿斯编,1888)、《梵文文法》(基尔荷恩,1888)、《汉文典》(甲柏连,1881)等。再次,东方历史研究成绩卓著。在汇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东方通史。还有建立东方学研究组织,召开国际性的东方学学术讨论会。1873年东方学家齐集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以后每隔3—4年举行一次。这些都标志着东方学的确立。

20世纪东方学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行列,以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民族文化视野研究东方学,以其材料充实的东方学研究成果,异军突起。西方的东方学也更加深入,趋向客观,各名牌大学几乎都设有东方学系或东方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期刊。一些研究领域非常繁荣,敦煌学研究不到一百年,却成为国际显学,汉学、日本学、中东学也因20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而成为显赫之学。一批经典性的东方学论著出版。东方学家的国际性合作研究也取得成功经验。如《伊斯兰百科全书》,汇集了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举行第34届东方学国际会议。一千多名来自各国的东方学者与会,就“中国踏进21世纪的门槛”,“珠江三角洲:潜力与机会”、“亚洲科技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佛教与佛学研究”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东方学的发展虽有400余年的历史,但其局限也很明显,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缺少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二,西方中心的立场。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当时的西方在工业革命后迅猛发展,把东方当作它们扩张的对象和倾销商品的市场。东方国家大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背景注定了东方学是西方人居高临下看东方的产物,带上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色彩。阿拉伯后裔的美国学者赛义德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对西方东方学的“西方中心”立场作了清理,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艺

作品，都存在严重的扭曲。西方人把东方当作异己的“非我”，构造出处处不如西方的东方形象。中国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神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① 不仅东方学者有这样具有民族情绪的看法，西方具有人类良知的学者也有同感。沃勒斯坦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是“一种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作的社会构造。现在正是这种构造的有效性受到抨击，抨击在三个方面：（1）这些概念不符合经验事实；（2）它们过于抽象，因此消除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3）它们是带有欧洲人偏见的产物”。他还说：“东方主义确立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权利的合法性，它在为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内的作用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中，确实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②

恐怕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当东方的学者加盟东方学研究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

当然，对东方学已有的成果不能一概否定，几百年里几代学者的努力，并非都心怀偏见，有的出于超功利的个人爱好，有的出于对真理的执著，对东方进行客观、公允的研究与评价。但不管怎样，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还需要更为切实、深入的工作，尤其是东方的学者，更是任重道远。

“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分支学科，研究亚洲、非洲的文学现象及其规律。东方文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初期。之前的 18、19 世纪主要发掘整理材料和东方古文字的解读。20 世纪初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1902）、温德尼兹的《印度文学史》（1909—1920）、汉密尔顿·吉布的《阿拉伯文学史》（1926）和俄国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

①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2 期。

② [美] 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7 年第 2 期。